

阳城,这一对进士父子

芷兰

阳城,商水也。初识阳城,始于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,“陈胜者,阳城人也。”再识阳城,也许是生命中的宿缘,十几年前参加公务员考试时我选择了阳城,从此和这片土地再难割舍。

既然是有缘,也为心中信念和情怀,我穿越在悠悠历史长河中,追寻阳城曾有过的人物和光芒,赴一场未知的约会,寻一种精神根部的共鸣。

读《商水县志》,我首先被这一对进士父子吸引住了。父姚晔,商水县化河乡姚桥村人,宋大中祥符元年状元,官至著作佐郎。子姚仲孙,字茂宗,本为曹南望族。曾祖姚仁嗣曾任陈州商水令,于此安家。仲孙为宋仁宗年间进士,后进龙图阁直学士,以才力自奋于时,论事著效,号为能吏,云云。

几年前读《宋史》时,我与姚仲孙曾有过“一面之缘”,对这位“能吏”颇有印象,但无了解,便向阳城文友“打听”,以得其详,

让我大为不解的是,大家都知道化河乡乃状元姚晔故里,却不知姚仲孙何许人也。心生诧异,也觉不安,于是驱车直奔化河乡杨树东行政村王庄自然村。村中间偏东处,临路,南北方向有一狭长干涸坑塘,坑塘北侧一片空地,当地人说,那就是姚晔少年读书的地方。听人说起姚晔的传说,脑海浮出画面:坑塘涨满清澈之水,乃曹河支流,徐徐汤汤,一直流到姚晔家门前。仲夏之夜,院内荷风送香气,朱露滴清响;院外青草舞流萤,池塘鸣蛙声。正挑灯夜读的姚晔,听到蛙鸣声后,嗔怪道,你们这样叫,我怎能安心?话音刚落,奇了,蛙鸣声立即止住,连流萤也钻入青草里,熄灭了它小小的灯盏。直到今天,依然如是。问,王庄村的夏天是不是从来听不到蛙鸣声,回答是,这故事便愈发神奇了。青蛙为什么这么听话,通人性?事后我想,或许是此处青蛙不仅听到了学子的琅琅书声,也听懂了书里的内容,就有了灵性和教养。

在坑塘北侧,面向坑塘的方向,一块墓碑,几■黄土,那便是姚晔墓了。有人说这只是姚晔的衣冠冢,也有人说姚晔去世后就葬于此。据说在文革中墓被人挖开,后又有人在此拢土成墓,立碑,成现在的样子。我反复观看墓地和碑文,无法确定真伪。只是感叹千年以前金榜题名时风光无限的状元郎,如今竟是这般境遇。

王庄村的东南方向,曹河北,麦收之后大片的田地显得尤为空阔,一尊姚晔塑像,那样孤单地立在姚庄村的田边。这是姚晔的老年塑像,头戴乌纱帽,身披黄色的斗篷,神态安详。塑像下有铭文,说姚晔自幼聪明,勤奋好学,19岁中秀才,22岁乡试中

举人,23岁中状元,宋真宗特赐袍笏,淡黄绢衫一领,淡黄绢带一条,加白襕,当即任命官职,即刻赴任。此任命开科考之先河,自此成为定制。姚晔中进士后,生平业绩,偶有文字记录,如说他做著作郎,于国史撰写上,十分谨慎,用词恰切。卒于职,葬于祖业地河滩地,即王庄坑塘北。

关于历史上的状元,据考证,从唐高祖武德五年(622年)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迦开始,到清朝光绪三十年(1904年)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,1283年间中国共出现(文)状元592名,这些殿试第一的天之骄子会被吏部授予的官职分别为:著作佐郎,掌修国史;秘书郎,掌管图书经籍;翰林院修撰,掌修国史,掌修实录;或任天子侍讲。然而,宋朝时的著作佐郎有别于国史院,仅参与汇编“日历”(每日时事),因此,姚晔在著作佐郎任上究竟从事什么工作,还真不敢妄断。

化河之行非但没有让我走近姚仲孙,反而让其父姚晔的故事丰富生动起来,问题是多半史书无载,虽目见耳闻,岂敢轻信。倒是可以推测,这姚晔父子,生于名门望族、官宦世家,在家庭的传承教育上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必是自小立下的志向,因此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是不二的选择,于此,便不得不提及隋唐以来的科举制。

从隋炀帝大业元年(605年)始,科举考试成为当时及之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制度,也几乎是知识分子唯一出路。宋朝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沿用唐制,但有很多变化和发展。如唐朝科举考试及第后,只是得到了做官的资格,还要通过吏部考试之后,优胜者才能授官。宋朝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,提高了及第者的地位和待遇,科举及第后,不需经吏部考试即可授予官职,而且官职的级别也有提高,这就是为什么姚晔考中状元后会立即被授予官职的缘由。

确立殿试制度也提高了科举地位,自宋太祖开宝六年(973年)始,殿试逐渐成为常制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(983年),始将殿试成绩评定登记,将进士分为三甲。宋真宗景德四年(1007年),颁《亲试进士条例》,规定进士入选者分为五等。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并确定名次,考生成为“天子门生”一种无上的荣耀。据《宋史·选举志一》记载:“进士科最广,名卿巨公皆系此选。”“登上第者不数年辙赫然显贵矣。”自此,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的思想开始成为主流,影响知识分子长达千年。

《亲试进士条例》颁布后的第二年,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,“上御崇政殿亲试进士,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八人为考官,临轩赐进士姚晔等一百六人及第……父晔,举

进士第一”。姚晔高中状元被记入《宋史》,然而前一条为公共记事,后一条,却是出现在子姚仲孙的列传中,略有尴尬。

宋朝科举,屡试不第者也能获得出路,大宋王朝对知识分子是包容的。开宝三年(970年),宋太祖特别诏赐贡士和诸科连续参加15次以上没有被录取的106人以本科出身;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,宋太宗诏连续参加10次以上至15次科举考试而没有被录取的180余人,并赐出身。对于屡试不第的考生,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,报名参加附试,称“特奏名”;也可以奏请皇帝开恩,委派官吏,升后世恩科之先例。我之所以如此这般介绍宋朝的科举考试,是想说,在宋朝能做官的不一定都有真本事,而像姚晔这样的天赋才子,殿试第一,大魁天下,为当朝财富,世间稀有。出身优渥,优秀传承,也脚踏实地,真才实学,这是我最佩服的。阳城人认为他是数千年采来周口地区唯一状元,值得纪念,2010年10月,在有关方面的主持下,先后在化河乡姚桥、姚庄村树立起青年姚晔立姿塑像、老年姚晔坐姿塑像。

站在姚晔的塑像前,内心彷徨,陷入沉思。历史是洞见过去照见未来的大鉴,还是拘于现实狭隘的功利,据说姚桥、姚庄两个村子为争姚晔各不相让,让青年姚晔和老年姚晔对峙而立,这种文化资源的争夺不止发生在本乡,许多地方都有。争夺的已不是历史,也不在人物。事实上,史书有载:“仲孙早孤,事母孝。”由此看,姚晔极有可能是英年早逝、壮年而亡,为他立老年塑像大可值得商榷的。也就这样吧,姚晔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,后人能记住他已是对他最好的纪念,我等又何必在细枝末节上纠结呢?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在曹河水的滋润下,化河乡出了姚晔这样的人才,成为家乡人的骄傲,为后世念念不忘。如今每逢初一、十五,总有莘莘学子在父母的带领下采拜祭姚晔,祈盼有状元保佑金榜题名。虽是迷信,但人们崇尚读书人、敬仰先贤、追求上进还是值得嘉许。让我觉得奇怪的是,我特意问了当地村民是否知道姚晔之子姚仲孙,所有人都摇头,说不知道。史书不为父亲立传,父亲却在家乡享盛名;儿子名垂青史,家乡却不知。这样的一对进士父子,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史书中,都是绝无仅有。

《宋史》为姚仲孙立传,无疑姚仲孙在历史中非一般人物,奇怪的是非但在家乡不名,就连阳城文友对其也知之甚少,至于我对他的关注,是与我从事的职业有关,理由很简单,姚仲孙是出自城阳、出自周口这片土地的清官。

最近,河南的连续暴雨让许多人开始了解处于三川交汇处的豫东周口市,而卧立在沙颍河岸几十年的铁水牛也进入了大家的视线。“勇敢牛牛、不怕困难”在朋友圈、短视频圈“火”了。

认真翻阅了有关铁水牛的记载,才发现它可谓是“牛生”坎坷。近百年风风雨雨,最早的铁黄牛经历了它的前世今生,再次出现在周口人民面前时,周口城已大变了模样,它也从铁黄牛摇身变为铁水牛,顺卧沙滩、面朝前方、双角拱月,呈喝水状。如今的人们都知道,今世的铁水牛是带着最初的“使命”来的,因为很早之前,在周口就有“铁牛喝水,沙颍河决堤”之说,意思是水位一旦到达铁牛嘴边,沙颍河上游必决堤。所以,每逢汛期到来,人们都靠铁水牛准确地提供安全标志,确保沙颍河无恙,它被周口人民称为“沙颍河卫士”。

可是,如今科技发达,水位测量技术更加科学、专业、精准,那么在这次泄洪过程中,城内老百姓为什么还是会时刻关注铁水牛的水位情况呢?

“一天水位上涨了近1米”“牛牛挺住,周口加油”……成了连日来最热的话语。

我想,大家之所以关注铁水牛,是因为在铁水牛身上有那个约定俗成的“度”,时刻关注这个“度”,才能在危险来临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,防早,防小,做到居安思危,防微杜渐,以“度”的安全,保一方平安。

经历过水流的反复冲刷后,支撑铁水牛的石柱上出现了明显的分隔线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洪水退去,分割线也随之慢慢消失。可是,铁水牛会记住这段历史,人民也会记住这段历史,因为“度”已刻在了心里。今天的沙颍河安然无恙,不是铁水牛“镇”住了水,而是因为那千千万万日夜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的党员干部,防洪官兵、抢险群众,还有那些牺牲万亩良田和家园保城市安澜的农民兄弟们。是他们,用担当与奉献,舍小家为大家,换来了全市人民安定的大局。

铁牛“镇水”的“度”,在于它能否精确报告水位、预警险情。党员干部的“度”,在于他能否出淤泥而不染,清白做人,干干净净做事。作为纪检监察人,我们也应像铁牛一样有“度”,对党忠诚要有高度,监督执纪要有力度,交友处世要有尺度,为民服务要有温度。

此刻,看着静卧的铁水牛,我猜想,也许正因为有了“度”,面临险情,我们党和政府才可以如此处变不惊,党员干部心中的“堤坝”才能如此坚不可摧,群众心中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才有增无减。

铁牛『镇水』因其有『度』

梁雅美



戴口罩、勤洗手
测体温、勤消毒
少聚集、勤通风

周回报业传媒集团 宣